

# 象牙塔之外

## • 另一種典型

## • 方勵之

陳兆勇

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中國大陸暴發學生運動，學潮所到之處，大學生紛紛起而爭取民主自由，要求中共進行改革，這股浪潮席捲了華中、華北大陸的菁華區，搞得中共頭目緊張異常，甚至導致權力階層結構改變、鄧小平被迫親手推倒自己一手刻意栽培的接班人——胡耀邦。引發這次學生運動，除因「大陸經濟改革受阻，政治體制改革被擱置」、對外部分開放後受到國際的影響，以及台灣政治的民主化消息傳入大陸，此外，「方勵之」個人的影響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學潮方興之時，方勵之正擔任合肥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之職，此校正是在七十五年十二月五日爆發學生示威，點燃了學運的火頭。而在這次的運動中，他也遭鄧小平第一個點名整肅，不但被撤副校長之

職，受到一連串批判，並且被開除「黨籍」。

方勵之是一個很優秀的科學家。在北京大學物理系原子核物理專業，五年成績是全五分（相當於全A），拿到金牌，是所謂的「金牌」畢業生。據知，在北大物理系歷來只有兩位「金牌」畢業生。他曾研究過固態物理與激光物理；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間開始研讀廣義相對論，進而研究天體物理，取得非凡成就，在國際間享有盛名。

然而在這次大陸學運中，他的影響力則是來自他對社會的關懷。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自然科學知識份子的另一種典型——關懷社會、關懷人。在學生之間，他廣受尊敬，甚至有「中國的沙卡洛夫」之稱。徐家巒（註一）認為，方勵之絕不是

以直接煽動的方式，去影響學生，而是學生信賴和愛戴他，受到他擇善固執直言的影響和感召。

雖然是物理學家，但方勵之始終保持了一份對人、對社會的關懷。在他仍在北大物理系求學時，在一次北大青年團代表大會上，在物理系團總支書記作工作報告時，他向主席要求發言道：「我們的團代會，首先應該討論一下究竟要把我們培養成什麼樣的人的問題……」一段話震驚會場，引起激烈討論，打亂了會議原定程序。但有關這問題的討論在第二天便受到學校黨委制止，當日在討論時熱烈發言的人都受了批評，報導討論內容的校刊編輯也作了公開檢討。

那次「陽謀」的行動中，在中共黨部喊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口號下，不少知識份子受了騙。方勵之在當時，和一些朋友都覺得國家民主和科學的精神不夠，而決定給「黨」上建言，然而信才剛開始草擬，反右鬥爭便開始了，他和幾個朋友被劃為右派，方勵之本人遭第一次開除黨籍的處份。

後來民國四十七年，中共成立了科技大學，決定把方勵之等當時被誤打入右派遭鬥的人，請到科大任教。然而，在民國五十五年的文化大革命，知識份子又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批鬥，所有科學研究完全停頓，方勵之也被打入「右派」，民國五十七被關入「牛棚」，一年多後才解放出來，又下放到礦場勞動改造，就在勞動工作之餘，他常閱讀手邊僅有的幾本廣義相對論著作，才進入了天體物理學領域，也算因禍得福。

民國六十二年，方勵之回到合肥科技大學任教，據徐家鸞表示，在六十九年他離開大陸之前，方勵之是絕口不提政治的，或許是一連幾次打擊，傷痕太深之故。然而理念是永不磨滅的，方勵之依然是保持對社會、對人的那份關懷。在後來多次演講與受訪中，他數度鼓吹民主、科學的精神，在這次學生運動中，方勵之並未直接參加，但基本上他是贊同的；他曾公開表示：合肥科技大學的學生示威抗議合肥市「人民代表」選舉不民主一事是符合「憲法」的（註二）。學潮暴發後，他並與由北平指派前來安徽處理學潮問題的萬里發生頂撞，無怪乎鄧小平要大為光火，而殺雞儆猴，迅速的「處置」了他。

遭到兩次開除「黨籍」，三次被整肅的方勵之；讓我們看到了自然科學知識份子的另一面典型，除了對學術的追求外，也對人、對這個社會付出一份關懷和熱愛。在科學史上，我們可以見到不少的學者，為社會、為人類付出了心血和努力，哥白尼、伽利略為了地動說而受教廷的警告，蘇俄的理論物理大師沙卡諾夫，因為爭人權而受迫害，當初為了原子彈的誕生盡了心力的一位科學家後來卻反而向美國總統陳情，反對積極發展核武，而愛因斯坦也在關懷社會上立下良好典範。在台灣，我們也可見到一些典範，吳大猷先生曾被稱為科技俠者，而就在清華園內，孫觀漢先生足為楷模，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李遠哲先生，於回國時，引起社會上一陣李遠哲旋風，不僅他的學術成就受到尊重，他對我們的體制、社會及觀念等的談話，也引起了廣大的迴響與震撼。

當然，並非所有的學者盡皆如此，我們是可以發現另一種典型的知識份子的。七十五年四月五日，聯合報上刊登了對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丁肇中先生的訪談，在被問到有關一些台大學生到立法院請願一事，丁肇中先生表示：「我認為大學生，尤其是理工系所的學生，應該將全部時間花在知識追求上，不適合從事這類活動。有人會認為我太守舊。不過，大學求學的時間很有限，人的能力也有限，不可能在有旁鶩的狀況下，能在學術上有所成就。」

追求高深的學識是需要付出許多心力的，任何一支研究課題往往足以讓人窮究一生。立心推動人類學術的脚步的人，往往就必須全力投注，在這樣的情況下，力分則弱，於是一心向學，走入學術的象牙塔，亦或給自己一份心力去關我們的社會，其抉擇有時是困難、甚或是痛苦的。個人心中對於兩種典型都是十分敬佩的。知識份子為社會的菁英，其對社會的影響力甚大；同樣的話並非無人呼籲過，然而李遠哲旋風引起的震撼卻較大。如果一個知識份子在學術的象牙塔外，肯為社會盡一份責任，無疑是社會之幸，其行為是值得尊敬和學習的。而學術殿堂的迷人，足以讓人一生投注而無悔，一個願以一生奉獻學術者，一樣是可敬可佩的。

生命的價值、成就是多面化的，知識份子可以選擇的路不是單一的。一個知識份子如果選擇了學術的路，可以奉獻全部的心力，也可以給予社會一些關心，然而對並非選擇學術路線的人，終有一天是要探出象牙塔，和這個社會有接觸的，身為

一個這樣的人，是否應該去關懷社會呢？

象牙塔內雖然與外界社會相當隔離，然而象牙塔畢竟是社會建造的，一個黑暗、落伍的社會是蓋不出好象牙塔的，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受教廷迫害；一個傑出的猶太科學家在納粹的壓迫下，必須流亡國外；方勵之的第一篇論文發排被阻，只得化名「王允然」發表；許多人都在問：如果李遠哲留在國內，是否有機會吹起這次旋風？……

知識份子不該放棄象牙塔，知識份子可以選擇一生待在象牙塔；但是，身為知識份子，如果願意、或者尚有餘力，是否可以偶而探身象牙塔外，給我們的社會一些關懷呢？

#### 【註解】：

註一：徐家鸞也是物理學家，從事「等離子體物理」(Plasma Physics)的研究，於四十七年和方勵之在合肥相會，曾長期共事，文革期間會同遭迫害，七十一年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訪問期間，毅然決定回到台灣。

註二：中共的「憲法」有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等等自由——見采風出版社，白樺的苦戀世界，「啊！古老的航道」一文 p.123。